

# 自修、德怀与义战<sup>\*</sup>

——儒家战略文化如何影响对外决策

逢锐之

**【内容提要】** 儒家战略文化对古代中原王朝的对外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先秦儒家典籍，可总结出儒家战略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四夷咸宾”为目的，在手段偏好中，自修与德怀优先于武力，在武力使用中讲求慎战与义战原则。然而，儒家战略文化内部也存在一定张力，在后期发展中，出现了“王者不治夷狄”的论调，并逐渐成为主流。王朝周期论、权力政治论和单极稳定论对对外决策的影响是战略文化影响的主要竞争性解释。依据西汉、北宋和明朝三个主要中原政权对外决策讨论的文本，能够发现儒家战略文化对对外决策的影响大于除单极稳定论之外的其他竞争性解释：当决策者及其时代受“四夷咸宾”较强影响时，其政策主张更积极，而“王者不治夷狄”有较强影响时，其政策主张较为消极。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偏好方面，自修与德怀优先于武力。此外，慎战与义战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遵循，但“四夷咸宾”论和义战原则在某些时候会削弱慎战原则。

**【关键词】** 儒家战略文化；对外决策；自修；义战；四夷咸宾

**【作者简介】** 逢锐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5) 01-0123-31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儒家战略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3CG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 一、引言

儒家思想虽然几经变迁，但一直是多数古代中原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儒家经典中鲜有关于对外政策的系统性论述。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战略文化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的战略文化也备受关注。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系统性梳理儒家战略文化特点、科学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的专著仍相对较少。

一般认为，儒家战略文化具有较强的防御性、审慎性和道德性，反对侵略扩张，对古代中原王朝对外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过，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对特定的对外战争表现出积极态度，如郭嵩焘认为，南宋以来儒家士大夫“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气习”。<sup>①</sup>一些外国学者则认为，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原王朝对外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sup>②</sup>

那么，儒家战略文化有哪些特质，此种特质在历史上是否具有一致性？儒家战略文化是否对中国古代政权对外决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

## 二、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特点及其影响的论述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的分析主要侧重三方面。一是儒家战略文化的特点。既有研究将儒家战略文化的特点概括为和平性、防御性和审慎性等。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认为，孔孟之教不推崇外在强制，强调以德服人、通过贤德扩张势力，贬斥暴力，不存在西方式的“神圣战争”特性，具有防御性的“长城心态”，对游牧民族强调安抚。<sup>③</sup>宫玉振认为，儒家战略文化具有道德主义传统，具有“非暴力性”与“非扩张性”，通过推行善治与教化夷狄可以避免冲突。<sup>④</sup>张一飞将孔孟战略思想列入“道德王国”和“主和”派。<sup>⑤</sup>杜哲元将儒家战略文化定义为“战略审

① 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359 页。

② 代表性观点参见江忆恩著，朱中博、郭树勇译：《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 费正清：《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载费正清、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陈少卿译：《中国古代的战争之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18 页。

④ 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3—85 页。

⑤ 张一飞：《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载《当代亚太》，2019 年第 2 期，第 4—40 页。

慎主义”，指出其主要内涵是道德至上、内治优先、心服为主。<sup>①</sup>刘铁娃则认为，儒家战略文化的特色是对战争的谨慎性和防御性。<sup>②</sup>

二是儒家对合理暴力使用的论述。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想当然地总结了“义战”思想，得出中国战略文化中存在“妖魔化”与彻底消灭敌人的因素，并且“义战”可以不顾手段与道德限制的错误结论。<sup>③</sup>向世陵指出，儒家肯定正义战争，谴责通过战争图谋私利、抢夺地盘，儒家正义战争的标准有维护君臣大义、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等；儒家强调战争动机，贬斥苟且换来的和平。<sup>④</sup>白彤东专门研究了孟子“仁权高于主权”的正义战争思想。<sup>⑤</sup>张铁军认为，儒家强调仁、义、德，将暴力作为“最后选择”，认为武力只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才具合法性，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特色为非暴力的“文化道德主义”。<sup>⑥</sup>

三是儒家战略文化之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江忆恩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以备战范式为主导，本质上仍是一种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儒家战略文化只是统治者美化并合理解释自身行为的理想性战略符号，是一种“语言习惯”。<sup>⑦</sup>施道安（Andrew Scobell）认为，儒家战略文化与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结合的产物是“防御崇拜”，使中国决策者自认为其任何军事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在危机中也更倾向于使用武力。<sup>⑧</sup>李晓燕和朱中博等反驳了江忆恩的观点，认为中国历代王朝高度内化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与和平性战略文化，反对使用武力获取国家安全，侧重防御。<sup>⑨</sup>杜哲元认为，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是古代中原政权的主导性和常态性战略文化，其对立

① 杜哲元：《扩张还是自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31—58页。

② Tiewa Liu,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Use of Force: Moral and Polit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3, No. 87, 2014, pp. 556-574.

③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76—77页。

④ 向世陵：《战争与和平：从〈春秋〉经传看儒家的正义》，载《孔子研究》，2019年第6期，第37—45页。

⑤ 白彤东：《仁权高于主权——孟子的正义战争观》，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31—139页。

⑥ Tiejun Zha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2002, pp. 73-90.

⑦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243页。

⑧ Andrew Scobell, “China’s Real Strategic Culture: A Great Wall of the Imagin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5, No. 2, 2014, pp. 211-226.

⑨ 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66—76页；朱中博、周云亨：《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性——〈文化现实主义〉再反思》，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36—51页。

面则是次要性、应激性和依附性的。<sup>①</sup> 费正清认为，受儒家战略思想影响，古代中国推崇“天下秩序”，其特点是善治和仁慈的等级制。<sup>②</sup> 冯惠云认为，在儒家战略文化影响下，中国整体对外战略是防御性的，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必将是和平与非扩张的。<sup>③</sup>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的认识主要存在四点不足。其一，有些学者选择性地使用文献，其结果或是片面与先入为主地认识儒家战略文化，在没有厘清儒家战略文化全貌的情况下便分析其影响，或是片面性进行案例分析。部分学者未能详细梳理儒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中的战略文化要素，将儒家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概括为儒家战略文化的特色。例如，大多数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以及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战略文化的特点为防御性、审慎性和道德性，强调自守内修、反对侵略扩张，但他们忽视了儒家典籍中也存在一些对古代圣王征伐的褒奖。而江忆恩等外国学者往往不熟悉儒家典籍，很少引用儒家文本，只是从二手文献得出“孔孟范式”的一些特征，既没有对该范式做出明确定义，也未提出操作性内容，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称儒家认为冲突是人类的反常行为、通过仁政或对外来威胁施以教化来避免冲突等儒家战略文化基本特点。<sup>④</sup> 在案例分析方面，江忆恩在研究战略文化对明朝决策的影响时只选取了明朝十余部奏折，罗列出几个决策者在不同时间上代表性有限的观点，而且某些文本的背景属于极端情况，如面临外敌主动侵略和蚕食领土时，使用武力是唯一选择。他们在研究中很少开展跨朝代的案例分析，更没有看到中国大战略的审慎特性。

其二，部分研究未能清晰界定战略文化等重要概念，或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存在偷换概念之嫌。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定义为“稳定的大战略偏好”。从定义上看，大战略包含了在实现国家目标中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运用，<sup>⑤</sup> 因此，战略文化也应比军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更广。但江忆恩在定义的实

① 杜哲元：《扩张还是自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31—58页。

②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③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Routledge, 2007.

④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240页。

⑤ 关于大战略的定义，参见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关于大战略概念的探讨，参见 Nina Silove, “Beyond the Buzzword: The Three Meanings of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27, No. 1, 2018, pp. 27-57.

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测度的是国家对使用军事力量的态度（如使用武力的效益和频率等），这就使大战略沦为军事战略，将战略文化等同于军事文化，即曾瑞龙所谓“基层的军事信念”和“军队内部的组织文化”。<sup>①</sup>与此相关，江忆恩还混淆了战术层面手段与大战略层面手段。在战术层面上，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战术，其本身就意味着消灭敌人，都必然涉及武力的实际使用和攻击性；<sup>②</sup>在大战略层面则不然，武力可以作为一种储备和威慑手段而不被实际使用。江忆恩在引用明朝文献时，将决策者奏疏中战术层面的攻击性当作大战略层面的攻击性，据此总结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备战和攻击性色彩”。不少学者虽然认识到了江忆恩定义的不足，却并没有给出合理的战略文化定义。此外，一些学者未按战略文化的定义选择分析对象，混淆了儒家对内与对外政策，甚至直接将儒家对伦理道德的一般性论述等同于其对外战略，或是将各分裂政权之间的关系同中原政权与游牧族群政权的关系混为一谈。<sup>③</sup>

其三，很多学者未能以科学的方式观察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权对外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在案例研究中未能具体地识别出哪些对外决策受到了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侧重于政策结果而忽视了决策过程。很多学者未能摆脱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的问题，即默认儒家战略文化是单一与恒定的，抱持战略文化决定论的观念，想当然地认为某种战略文化必然导致特定的行为模式。在他们的分析中，儒家战略文化对历代对外决策具有不言自明的影响，历代王朝审慎与反对扩张的对外政策选择必然受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正如江忆恩所述，由于影响战略行为的变量远非战略文化一种，地缘政治和权力对比态势都会影响战略选择，且其影响力很可能大于战略文化因素。<sup>④</sup>因此，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之间不一定存在相关性。为此，江忆恩提出了权力政治—王朝周期这一竞争性解释，<sup>⑤</sup>而很多学者未给出竞争性解释，也就无法判定某一战略行为是受战略文化影响而非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

其四，不少研究忽视了儒家战略文化内部的差异及其历史发展与演变。战略文化

①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② 参见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陈川译：《战争论》（第一卷），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版，第22—23、199—201页。

③ 例如，杨联陞在探讨儒家对待外族传统时多次引用儒家关于中原政权更迭的论述，参见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pp. 26–27. 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参见孟维瞻：《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50—77页。

④ 例如，王元康认为中国的战略主要受情势而非文化影响，参见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8.

⑤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7—11页。

既然属于文化，就应受到当时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同时代的学术旨趣不同，所面临的对外政策问题及其背景也不同，这会使某一种战略文化在保有基本元素的同时还会有所调整。<sup>①</sup> 中国各个时代儒学旨趣有所不同（如经学与理学具有一定差异），儒家战略文化显然也不会完全不变。此外，儒家战略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逻辑一致性，但也不乏冲突之处。既有研究多将儒家战略文化的内容视为逻辑统一、静态和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符合历史实际，仅考察特定朝代或特定时期的战略尤易产生此类问题。

###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战略文化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往往是间接性的，其影响通常不会比敌我权力对比与地缘政治等因素更具决定性。不过，战略文化可以影响特定决策参与者的对外政策偏好，使其在对外决策讨论中有所倾向，从而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决策者的决策讨论过程——其载体是政策讨论的文本，而非政策的结果（如战争或议和等）。

借鉴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江忆恩的定义，<sup>②</sup> 本文将战略文化定义为：决策者和战略界通过传授和继承而形成的关于大战略的持久与稳定的观念、信念、态度、偏好和情感。其操作性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某一政权在对外关系中战略目标和对实现目标的各政策工具的偏好排序，二是该政权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如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和限制）。广义的战略文化还包括对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对敌人性质和对武力使用效用的认知，这些内容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战略文化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在形成之后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sup>③</sup>

分析儒家战略文化对外政策讨论的影响可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归纳儒家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本文首先根据五经经传以及《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代表作概括儒家战略文化基本要素。本文只选取这些文献中关于对外政策的论述，不讨论其中涉及修身和内政的部分。在归纳出儒家战略文化特质之后，本文

<sup>①</sup> 关于对中国战略文化要素“永恒性”的批判，参见 Andrea Ghiselli, “Revising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Contemporary Cherry-Picking of Ancient Strategic Though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3, 2018, pp. 166–185.

<sup>②</sup>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Rand Corporation, 1977, pp. 8–9;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 39—40 页。

<sup>③</sup>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 4.

将提出儒家战略文化影响各中原政权对主要外部对手政策讨论的假说。

第二步，选择战略文化的竞争性解释。江忆恩的权力政治—王朝兴衰模型认为，只要权力资源允许，帝国就会扩张。在王朝早期，帝国权力资源不断积累，会采取越来越具有扩张主义和强制性色彩的战略；随着王朝的衰退，国家转而采取更具静态防御性的战略与和解性策略。<sup>①</sup>按照权力政治的观点，帝国在实力远强于外部对手的情况下，也会采取军事强制手段实现其对外目标，反之则会采取防御性政策。与这一理论相反，单极稳定论认为，在某一地区内，一国如果处于单极地位，则该地区维持稳定的概率较大，单极国家也没有强烈意愿采用军事手段实现其对外目标。<sup>②</sup>与战略文化解释模式不同，这些竞争性解释包含了大多数物质性解释因素，是“非战略文化、非历史的模式”。<sup>③</sup>因此，王朝周期模型、权力政治论和单极稳定论可视为战略文化影响对外政策讨论的竞争性假说。

第三步，选取中原政权具有代表性的对外决策讨论案例进行分析并与竞争性解释比较，验证儒家战略文化解释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解释力。

本文主要选取历代中原政权在战略环境相对宽松、未出现巨大内部动荡的背景下针对主要对手的政策讨论作为案例。本文严格限定对外政策讨论的范围，即中原政权针对具有威胁性的游牧和渔猎族群建立的政权而非针对其他中原割据政权制定政策时的讨论，其对象是“次外地缘”和“外地缘”政权。<sup>④</sup>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原政权对匈奴和辽金等“次外地缘”政权的政策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的政策，并不能算作“对外政策”。不过为表述方便，本文仍使用“对外政策”一词，这里的“外”是指“某政治实体之外”，而非“民族共同体”之外。之所以如此选择案例，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封建割据政权之间关系与处理中原政权和游牧、渔猎族群政权的关系时遵循的逻辑有所不同。

之所以选取中原政权，是为了避免统治集团生活习性与族群性格等因素的可能影响。选择战略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形则是因为在外族大规模入侵等极端情况下，战

①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60—62页。

② 逢锐之：《极数与国际体系稳定性关系的分层研究》，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5期，第4—36页。

③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第63页。

④ “次外地缘”政权是指“过去在很长时期内不在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权的管辖之内，但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后来与汉族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外地缘”政权是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处于中国疆土之外但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参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略文化很有可能并不能发挥重大影响。<sup>①</sup> 选取内部不出现巨大动荡的案例是为了控制变量，内部巨大动荡通常会对中原王朝对外政策讨论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为增强案例的稳健性，本文将选取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儒家学术旨趣有所变化的案例，还在部分案例中引入道家战略文化与儒家战略文化进行对比。

在上述条件的约束下，本文选取了三个案例：一是西汉文帝到宣帝时期对匈奴的政策讨论，二是北宋太宗到真宗时期的对辽政策讨论和仁宗到徽宗前期的对西夏政策讨论，三是明朝永乐时期到万历中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在这些案例中，中原政权大多数情况下战略环境相对宽松、内政未出现巨大变动，儒家战略文化的内容与影响力以及中原政权与其主要对手之间的权力对比都有变化，能够较好地检验儒家战略文化和竞争性解释对政策讨论的影响，增强研究的稳健性。

第四步，测度战略文化对外政策讨论。本文主要通过决策者对外政策讨论的文本观测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如果儒家战略文化对对外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则决策参与者应遵循既有儒家典籍中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随着儒家战略文化本身及其影响力的演变，决策者对外政策讨论中的观点也有所变化。具体来讲，本文测度儒家战略文化影响可遵循两条标准：一是决策者在政策讨论中是否经常引用儒家战略文化话语以及相关政策讨论是否符合儒家战略文化的逻辑。若决策者在政策讨论时较多使用儒家文本或类似表述，且该表述与儒家对外政策理念和逻辑较为一致，则能够说明儒家战略文化对对外决策具有影响。二是决策时的儒家话语是否与决策结果一致。本文主要依据第一个标准，原因在于与召令等对外政策宣示相比，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言论往往更能反映决策者的真实想法。

#### 四、儒家战略文化的形成

先秦时期是儒家战略文化的形成时期。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五经经传对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以及对战争的态度和原则都有论述，儒家战略文化的主要特质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型。

先秦儒家对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可归纳为御外保民、保卫文化与社稷以及大一统

---

<sup>①</sup> 如阿诺德·沃尔福斯将国际环境中的极端压力比作“着火且只有一个出口的房间”，此时行为体将做出类似的选择。参见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 13。



三方面。御外保民即“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田有禽，利执言，无咎”。<sup>①</sup> 保卫文化即“救中国而攘夷狄”，“不与夷狄之主中国”，防止“被发左衽”；<sup>②</sup> 保卫社稷即“执干戈以卫社稷”。<sup>③</sup> 大一统虽主要是对内目标，但也包含对外目标，《公羊传》认为“大一统”还意味着“王者无外”，“王者欲一乎天下”，要达到四方归服的目的。<sup>④</sup> 对待不服的国家，可以“以王命讨不庭”。<sup>⑤</sup> 御外保民与保卫文化两个目标为大多数文化所有，大一统尤其是“王者无外”的观念则为儒家战略文化中较有特色的部分。

先秦儒家普遍认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根基是修饬内政，可概括为“自修”：“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攻战之本，在乎壹民”。<sup>⑥</sup> 自修能够树立榜样，使四方归服：“悖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惠此中国，以绥四方”。<sup>⑦</sup>

先秦儒家大都认为增强武备是自修的重要内容，很多儒家代表人物并不认为军事冲突是反常现象。《左传》载宋子罕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所以兴，乱人所以废”。武力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只有在实力相侔基础上，有德者才会胜出，即“同力度德，同德度义”。<sup>⑧</sup> 国家必须注重军事、整顿武备。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强调军事建设的重要性，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sup>⑨</sup> 巩固边防、修缮兵器和习练军事应当是国家的常态化政策：“除戎器，戒不虞”；“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固封疆，备边境”；“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sup>⑩</sup> 先秦儒家经典普遍认可文武相济、武力强盛才能保卫国家，并对文武兼备的大臣加以褒奖：“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文武吉甫，万邦为宪”。<sup>⑪</sup> 孔子本人赞赏“衽金革，死而不厌”的精

① 《孟子·梁惠王上》《易·师·六五》。

② 《公羊传·僖公四年》《公羊传·哀公十二年》《论语·宪问》。

③ 《礼记·檀弓下》。

④ 《公羊传·隐公元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⑤ 《左传·隐公十年》。

⑥ 《左传·宣公十二年》《荀子·议兵》。

⑦ 《尚书·尧典》《尚书·舜典》《尚书·大禹谟》《尚书·旅獒》《诗经·大雅·民劳》。

⑧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尚书·泰誓上》。

⑨ 《论语·颜渊》《论语·子路》。

⑩ 《易·萃·象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礼记·月令》《谷梁传·昭公八年》。

⑪ 《史记·孔子世家》《礼记·祭法》《尚书·大禹谟》《诗经·小雅·六月》。

神，有文献记载，冉有称孔子“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并通于战法。<sup>①</sup>

此外，“备豫不虞”也是自修的重要部分。《左传》多次记载这一观点：“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完其守备，以待不虞”，《易传》亦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sup>②</sup>

先秦儒家认为以德怀柔、招徕远人（简称“德怀”）是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要“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柔远能迓”，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sup>③</sup>部分儒家代表人物强调使远人归附，即“修文德以来之”、招揽远人，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最终“用夏变夷”。<sup>④</sup>典型案例是大禹“执干羽舞于庭，三旬而有苗格”，商汤“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sup>⑤</sup>为实现对外战略目标，先秦儒家并不反对使用武力，但普遍认为德怀要优先于使用武力。西汉刘向总结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sup>⑥</sup>

先秦儒家不反对使用武力，但强调必须具有正当理由才能使用武力，即“奉辞罚罪”、进行义战。只有义战能保持部队士气，增加获胜概率，“师直为壮，曲为老”。<sup>⑦</sup>只要符合御外保民、保卫文化与社稷及大一统目标的军事行动都符合义战标准。义战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禁残止暴”的战争，<sup>⑧</sup>如禹以“反道败德”为由征三苗，启以有扈“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伐之；<sup>⑨</sup>二是征讨“不庭”的战争或武力威慑，如禹征有苗，周成王“四征弗庭，绥厥兆民”，鲁侯伯禽征淮夷、徐戎，周宣王讨伐“不庭”的徐国，派遣方叔威慑蛮荆；<sup>⑩</sup>三是保卫疆土或文明的战争，前者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sup>⑪</sup>后者如齐桓公联合诸夏尊王攘夷，救燕邢、存卫、威慑楚国，扭转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态势。《公羊传》赞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孔子称“微管仲，吾其

① 《中庸》《孔子家语·正论解》。

② 《左传·文公六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左传·襄公十一年》《易·系辞下》。

③ 《左传·僖公七年》《尚书·舜典》《尚书·武成》。

④ 《论语·季氏》《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滕文公上》。

⑤ 《尚书·大禹谟》《尚书·仲虺之诰》。

⑥ 《说苑·指武》。

⑦ 《尚书·大禹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⑧ 《大戴礼记·用兵》，类似表述还有“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司马》）；“吊民伐罪”（《孟子·滕文公下》）；“禁暴除害”（《荀子·议兵》）；楚庄王论“武有七德”（《左传·宣公十二年》）。

⑨ 《尚书·大禹谟》《尚书·甘誓》。

⑩ 《尚书·周官》《尚书·费誓》《诗经·大雅·常武》《诗经·小雅·采芣》。

⑪ 《诗经·鲁颂·閟宫》。

被发左衽矣”。<sup>①</sup>

先秦儒家也注重武力的使用限度。即使师出有名，作为反制的义战也应与对手侵略程度相应，而不应大幅超出，不能“蹊田夺牛”。<sup>②</sup>反对彻底消灭敌人，主张“存亡继绝”甚至留取外患以资自省，“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sup>③</sup>

同时，先秦儒家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无勤民于远”。<sup>④</sup>战争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使贤君武丁三年才攻下鬼方，平庸的君主犹当慎战。<sup>⑤</sup>孔子所慎，“齐，战，疾”，主张对待战事“临事而惧，好谋而成”。<sup>⑥</sup>先秦儒家反对远出国境的大规模征讨和穷追敌人，歌颂尹吉甫“薄伐玁狁，至于大原”。<sup>⑦</sup>

此外，先秦儒家认为自修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基，而义战是手段。如果使用武力妨害了自修，即使是义战，也是本末倒置。齐桓公晚年本末倒置，预示了齐国的衰乱：“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其在乱乎。”<sup>⑧</sup>

除自修与武力手段外，也有先秦儒家典籍记载了使用外交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案例。例如，孔子在卫国得到齐田常欲伐鲁的情报，令子贡进行外交活动，通过外交努力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晋国魏绛以“和诸戎狄”，使晋国“八年之中，九合诸侯”。<sup>⑨</sup>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并未对外交手段进行理论性论述，后世不少儒家代表人物认为外交操作属于“诈术”并对其予以贬低。<sup>⑩</sup>

先秦儒家典籍中也包含了某些扩张性因素。周宣王命令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古文《尚书》载“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范武子认为“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sup>⑪</sup>荀子主张通过自修扩大对敌优势，等到“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之时，“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

① 《公羊传·僖公四年》《论语·宪问》。

② 《左传·宣公十一年》。

③ 《孟子·告子下》《左传·成公十六年》。

④ 《左传·隐公四年》《国语·周语上》。

⑤ 《易·既济·九三》。

⑥ 《论语·述而》。

⑦ 《诗经·小雅·六月》。

⑧ 《左传·僖公九年》。

⑨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左传·襄公十一年》。

⑩ 孟子贬低张仪、公孙衍（《孟子·滕文公下》）；扬雄称张仪、苏秦为“诈人”（《法言·渊騫》）。

⑪ 《诗经·大雅·江汉》《尚书·仲虺之诰》《左传·宣公十二年》。

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sup>①</sup>当然，扩张性因素远非儒家战略文化的主流。

通过前述梳理，可以大致得出先秦儒家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先秦儒家的大战略目标是御外保民、保卫文化和“四夷咸宾”。先秦儒家以自修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根基，其中武备是自修的重要内容；德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先于使用武力；不排斥使用武力，但必须遵循义战原则，并应慎战。与一般认为的儒家的非扩张性、非武力性和防御性稍有不同，先秦儒家并不反对非暴力扩张（德怀）和非扩张性进攻（义战不反对进攻性军事行动，但其使用情景和慎战原则决定了其非扩张性<sup>②</sup>）。因此可以说，先秦儒家的战略文化要素是以保卫国土和维护优势地位为大战略目标（“四夷咸宾”），实现目标的偏好是以内部制衡手段增强相对实力、软实力优于军事手段（自修、德怀先于义战），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则是通过人道主义干涉、征讨优势地位的反对者、保卫国土和保卫文化，并强调应谨慎使用武力。

但是，儒家战略文化并不具有逻辑上的高度一致性，自修、慎战的主张与“四夷咸宾”的大战略目标、义战的原则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例如，祭公谋父“无勤民于远”的观点即与“四夷咸宾”存在一定矛盾，孟子也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sup>③</sup>在后来的发展中，部分儒家学者出于慎战的主张逐渐开始放弃“四夷咸宾”的目标。王莽当政时期，严尤认为应当将匈奴入侵视为“蚊虻之螫，驱之而已”。<sup>④</sup>东汉时期，班固提出对“夷狄”应“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sup>⑤</sup>何休则在注疏《公羊传》时提出“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sup>⑥</sup>根据这两种观点，中原对外敌羁縻笼络防备即可。班固的观点已偏离“王者无外”的目标，在当时并非主流；何休“王者不治夷狄”论只适用于“所传闻世”（即据乱世），<sup>⑦</sup>但二者却被后世广泛引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荀子·富国》。

② 御外保民和保卫文化本身不具有扩张性，为“四夷咸宾”进行的义战只要求对象归服，并不要求占领土地，因而也是非扩张性的。

③ 从汉到宋，孟子的地位虽然在逐渐提高，但其地位与孔子、六经仍然不能比拟。由于两汉以经学为主，而荀子在传经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汉朝的大部分时期，孟子的地位不如荀子。直到南宋中后期孟子的“亚圣”地位才基本确立。

④ 《汉书·匈奴传下》。

⑤ 《汉书·匈奴传下》。

⑥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⑦ 徐彦认为，“王者不治夷狄”只是“所传闻世”的原则，此时“王者草创，夷狄有罪不暇治之”。何休认为在“所见世”仍应使“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参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7页。

根据对儒家战略文化以上特质的归纳,本文提出儒家战略文化影响决策者对外政策讨论的三个假说。

假说1:在战略目标方面,早期受“四夷咸宾”论影响较大,后期发展中“不治夷狄”论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当决策者及其时代受“四夷咸宾”论影响较大时,政策主张更积极;而“不治夷狄”论具有较强影响时,政策主张较为消极。

假说2: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偏好方面,对外政策讨论注重自修,认为自修与德怀应先于武力。

假说3:在武力使用原则方面,使用武力必须符合义战原则,且应慎战。但是,“四夷咸宾”论和义战原则在某些时候会削弱慎战原则。

## 五、儒家战略文化与西汉、北宋、明三代的主要对外政策讨论

文帝到宣帝时期的西汉、太宗到徽宗时期的北宋以及永乐到万历中期的明朝都是中原政权,受儒家战略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儒家战略目标有所变化。三个时期中原政权均具有丰富的对外关系实践,政权生存均不存在巨大威胁。三个时期中原政权与外部实力对比都出现明显起伏,为检验儒家战略文化三个假说及其竞争性解释对这三个时期的对外关系影响提供了史实依据。

### (一) 西汉文帝至宣帝时期的对匈奴政策讨论

西汉文帝到宣帝时期,汉朝与其主要对手匈奴的实力对比此消彼长,儒家思想影响逐渐增加,史籍简要记载了不同派别代表人物对匈奴政策的讨论。

#### 1. 文帝至武帝早期的对匈奴政策讨论

文帝至武帝早期,汉朝尚处于秦末农民战争的恢复时期,而匈奴在冒顿、老上和军臣几代单于的领导下,力量空前强盛,汉朝国力与匈奴相比处于劣势。这一阶段儒家思想影响力有限,文帝时,开国时期的武将功臣仍有影响,朝廷虽多用儒士,但文帝本身好刑名;景帝不用儒生,窦太后偏好黄老。<sup>①</sup>这一阶段,除文帝外,史载参与对匈奴决策讨论的有贾谊和晁错等,贾谊作为荀子再传弟子是儒家代表,<sup>②</sup>晁错则儒法兼修。

文帝在对匈奴战略目标上具有鲜明的黄老特色,<sup>③</sup>认为“兵凶器,虽克所愿,

① 参见《汉书·儒林传》。

② 关于贾谊与荀子的关系,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页。

③ 关于刑名与黄老的关系,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动亦耗病”，<sup>①</sup>继承了汉初“偃武一休息，羸靡不备”的政策，不进行主动军事行动。<sup>②</sup>匈奴入侵时，文帝一度断绝和亲进行反击，甚至曾萌生亲征的想法，但仍主张与匈奴以长城为界，“寝兵休士……以安边民，世世平乐”，<sup>③</sup>“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天下祥和、泽及禽兽。

贾谊与晁错对匈奴的战略目标则比文帝积极，不过仍具有一定的非进攻性的扩张性色彩。贾谊认为，匈奴人口不如汉朝千石大县，而汉朝却“岁致金絮彩缯以奉之”，无异于“入贡职于蛮夷”，成为戎人的诸侯，这是尊卑颠倒的“倒悬”之势，是奇耻大辱。汉朝对匈奴的目标应是“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禽敌国而后止”，灭亡匈奴，使之归降。晁错认为应对匈奴立威而制服之。<sup>④</sup>

从政策手段偏好来讲，三位决策者都重视自修。文帝重视农业生产和经济恢复，贾谊与晁错则将农业生产视为对外战略的根基。贾谊认为，对匈奴战略需要财力支持，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积贮。只要粮食充足、财富有余，则“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sup>⑤</sup>除积贮外，还需要修饬内政，“去二族，弗使乱国，天下治富矣”。<sup>⑥</sup>晁错同样重视“劝农力本”，认为即使“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只有鼓励粮食生产，“使天下人人粟于边”，边地才能御敌。<sup>⑦</sup>

从具体政策来看，文帝在对匈奴政策上具有消极防御的色彩，主张“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一方面与匈奴和亲“结兄弟之义”，另一方面在飞狐、北地、细柳、霸上和棘门等地屯兵备胡。与文帝不同，贾谊和晁错偏好更为积极的政策。贾谊反对和亲政策，强调“战德”的重要性，提出以“三表”“五饵”为手段的“耀蝉之术”。<sup>⑧</sup>具体做法是开通关市，使匈奴得以购买汉朝佳肴酒食，厚待匈奴使臣与降将，并赠予匈奴人汉朝的车马、音乐、女子和高堂邃宇，改变其生活习惯，招降、

①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家学说原则上反对用兵，儒家则并无此说。

② 《史记·律书第三》。

③ 参见《汉书·匈奴传上》，此句为冒顿单于给文帝的书信，文帝“甚嘉之”，认为这是“古圣王之志也”。

④ 《新书·势卑》《新书·解县》《新书·匈奴》《汉书·爰盎晁错列传》。

⑤ 《汉书·食货志上》。

⑥ 参见《新书·匈奴》，后世猜测“二族”是指吴王刘濞和邓通。

⑦ 《汉书·食货志上》。

⑧ 《新书·匈奴》。“耀蝉之术”取自《荀子·致士》，原文为“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离间和分化匈奴，“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使“中国日治，匈奴日危”，“中国乘其岁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死亡”。<sup>①</sup>晁错认为汉朝与匈奴所擅长的军事技能不同，而归附汉朝的胡、义渠、蛮夷同匈奴的军事技能相仿，应当结合汉军与这些外族所擅长的军事技能，“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达到“以蛮夷攻蛮夷”的目的。同时，利用边民“全亲戚而利其财”、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提出“徙民实边”以御匈奴的策略。晁错还主张给予匈奴沉重打击，立威并使匈奴终身惩戒。<sup>②</sup>

贾谊认为其“耀蝉之术”效法了舜帝降服三苗的手段，是“以厚德怀服四夷”的“德胜”做法。<sup>③</sup>现存资料虽未谈及贾谊对匈奴使用武力的看法，但从逻辑上讲，俘获单于、中行说最终还需使用武力。当然，贾谊显然认为“战德”优先于武力。晁错则并未讨论过类似思想。

文帝明确主张“汉过不先”，即汉朝不首先违反双方约定或进攻。贾谊虽未明确讨论武力使用的条件，但从其论述逻辑来看，匈奴对汉朝不敬、“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是汉朝对其使用武力的合理条件。<sup>④</sup>二者都体现了义战的逻辑。晁错则未讨论武力使用的道义问题。

贾谊与晁错在政策主张上虽都较为积极，但皆主张慎战。贾谊虽未论及对匈奴用武，但从其著作来看，其反对倚强凌弱、穷兵黩武的态度十分鲜明；晁错则认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胜败在俯仰之间，以死争胜，一旦战败，悔之莫及。<sup>⑤</sup>

在本案例的检验中，只有权力政治论未通过检验，汉朝相对弱势并未阻止其积极的对外政策讨论。汉朝在建立初期，对外政策讨论确实相对积极（王朝周期论）；在非单极体系中，决策者有一定不甘与不安，其政策讨论具有一定的扩张性色彩（单极稳定论）。贾谊和晁错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对外目标较文帝更积极（假说1），贾谊主张德怀或德胜手段先于武力；贾谊和晁错都强调自修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假说2）；文帝和贾谊都秉持义战原则，主张慎战（假说3）。本案例还发现，贾谊的对外政策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非暴力色彩，即德胜。与贾谊相比，晁错未曾谈论与德胜相关的话题，也没有触及义战问题，较少谈论战略目的，原因可能在于晁错受法家影响较重，更重视术与势，对道义和长远目标的重视程度较低。

需要指出的是，史籍对本阶段对外政策其他参与者（包括景帝）观点的记载较

① 《新书·匈奴》。

② 《汉书·爰盎晁错列传》。

③ 《新书·匈奴》。

④ 《新书·匈奴》。

⑤ 《新书·过秦》《汉书·爰盎晁错列传》。

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阶段检测的可靠性。

## 2. 武帝至宣帝时期的对匈奴政策讨论

这一阶段，汉朝经过休养生息，实力逐渐增强，匈奴则在汉朝的武力和“战德”政策打击下于昭帝之后逐渐分裂。<sup>①</sup>公元前71年，由于天降大雪以及丁令、乌桓、乌孙的联合攻击，匈奴实力大减。这一阶段，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这一时期已初现“不治夷狄”论的支持者。主父偃和韩安国等人认为匈奴土地贫瘠，得之无益，常年用兵会导致民生凋敝；匈奴人的天性是“行盗侵驱”，因此对匈奴的政策应是“禽兽畜之，不比为人”，<sup>②</sup>不应追求降服。在盐铁辩论中，少数文学代表亦持类似观点，这类决策者大都倾向于和亲政策。但主要的儒家代表人物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如董仲舒主张王者应“一统于天下”，“爱及四夷”，使四海臣服，“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sup>③</sup>在盐铁辩论中，贤良代表和大部分文学代表亦认为得道的君主应使“遐迩偕行而归之”。大夫（桑弘羊）虽受法家影响较大，但其对匈奴的战略目标是使之臣服，<sup>④</sup>这一点与儒家“四夷咸宾”的观念一致。史料并未详细记载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目标，只记载其认为不征伐匈奴则天下不安，且要为高帝吕后报仇。<sup>⑤</sup>桑弘羊作为武帝政策的继承者，其观点应能反映武帝的看法。从具体政策来看，主张“四夷咸宾”的决策者对外政策建议也相对积极。董仲舒认为，匈奴不知仁义，对其应“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sup>⑥</sup>这一建议与贾谊的思路相近。武帝、桑弘羊则主张积极对外征伐。

从手段偏好来看，大多数决策者认为自修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前提。董仲舒发挥春秋之义，认为应当先治近而后治远。<sup>⑦</sup>韩安国认为，对匈奴应“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常坐而役敌国”。<sup>⑧</sup>在盐铁辩论中，无论是桑弘羊的增强武备，还是贤良的“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sup>⑨</sup>都是自修的内容，但贤良认为“德盛则备寡”与先秦儒家的自修原则相悖。

该阶段大多数决策者主张德怀先于武力。董仲舒认为《春秋》之义，任德不任

① “战德”大战略行之有效。景帝时，匈奴寇边行为大为减小，不少匈奴要员降汉；马邑之围前，“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参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汉书·匈奴传上》。

②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③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④ 《盐铁论·备胡》。

⑤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汉书·匈奴传上》。

⑥ 《汉书·匈奴传下》。

⑦ 《春秋繁露·竹林》。

⑧ 《汉书·窦田灌韩传》。

⑨ 《盐铁论·本议》。



力,“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应使“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sup>①</sup>盐铁辩论中,贤良主张对外政策应“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务以德安近而绥远”。<sup>②</sup>公元前57年,五单于争位,汉朝很多决策者建议“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萧望之则建议派遣使者吊问匈奴,帮助匈奴弱小势力,其必“称臣服从”,体现汉朝“德之盛”,使四夷都景仰中国的仁义之举。<sup>③</sup>

该阶段决策者大都主张慎战。公孙弘、主父偃、庄安和徐乐都劝谏武帝不可连年用兵,韩安国尤其反对“深入长驱”,夏侯胜因武帝“穷兵黩武”而反对为其立庙。<sup>④</sup>盐铁辩论时,文学反对“毕匈奴而远几”,认为“战胜而不休”会导致“身死国亡”,“役不可数行”,甚至认为“兵者凶器”,应做到“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反对任何武力。<sup>⑤</sup>文学的主张与儒家义战的观点相去较远,已偏向道家。武帝和桑弘羊等以武力为优先手段、常年用兵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受到“四夷咸宾”战略目标的激励,但与儒家慎战思想背道而驰。

当然,德怀优先与慎战思想并非在原则上反对扩张与战争,而是反对穷兵黩武,这一阶段大多数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上都具有积极趋向。即便具有“不治夷狄”倾向的主父偃也提出营建朔方城以减少内地后勤补给,作为“灭胡之本”。公孙弘起初反对营建朔方,但在与朱买臣辩论后亦转向支持。<sup>⑥</sup>

面对匈奴的侵扰,桑弘羊称赞武帝“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以及“讨暴卫弱,定倾扶危”之举的正义性,<sup>⑦</sup>大多数决策者也并不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正义性征讨,只是反对其在匈奴没有过失时的军事行动(马邑之围)和穷兵黩武。昭宣之时,匈奴内部矛盾激化,汉朝对匈奴权力优势更为明显,但汉朝大多数时期遵循义战原则,在缺少适当理由之时,并没有利用权力优势对匈奴发起大规模攻击。桑弘羊趁匈奴“孤弱无与”的“困亡之时”对其再行征讨,防止其“得复喘息”的观点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sup>⑧</sup>公元前64年,匈奴包围郑吉率领的在车师的屯田军队,宣帝与名将赵充国等人商议攻打匈奴右地,使匈奴不再能袭扰西域。魏相上书劝谏,提出了几种军事行动的区别,即义兵、应兵(防御性反击)、忿兵、贪兵和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盐铁论·备胡》《盐铁论·西域》。

③ 《汉书·萧望之传》。

④ 《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

⑤ 《盐铁论·论功》《盐铁论·世务》。

⑥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⑦ 《盐铁论·备胡》。

⑧ 《盐铁论·击之》。

骄兵，指出匈奴近期对汉朝展示了善意，虽然两国在车师争夺屯田，但这并不是汉朝攻击匈奴本土的合理理由；五单于之乱时，萧望之引用春秋时期晋士匄的典故，劝谏宣帝不应“乘乱而幸灾”并“不以义动兵”，宣帝听从了二人的意见。<sup>①</sup>

汉匈实力这一阶段差距拉大，但除武帝和桑弘羊等极少数例外，大多数决策者倾向于以德降服匈奴、慎战而非武力进讨，决策者并不反对汉武帝对匈奴的正义性征讨，但大都反对不符合义战标准的武力征讨。公元前71年之后，汉朝很少再对匈奴用兵，这一发现与假说2、假说3相符，也与单极稳定论相符，而与权力政治论不符。总体而言，大多数决策者的对匈奴政策讨论都相对平和，持“四夷咸宾”论的决策者只是比“不治夷狄”论的决策者略为积极，其中桑弘羊最具进取性，董仲舒和萧望之相对积极。持“不治夷狄”论的主父偃的部分政策主张也具有积极性，但韩安国和少数文学代表则明显更为消极。假说1只得到了微弱的支持，这或许是因为“不治夷狄”论此时只是稍见端倪，并未成为主流。王朝周期论对汉朝周期的解释与这一阶段并不契合，无论是武帝鼎盛时期还是昭宣中兴之时，在对外政策讨论中都没有显现出明显的扩张性。

## （二）北宋太宗至徽宗时期的对辽和西夏政策讨论

相对来说，宋朝与其主要敌手的实力变化并不明显，王安石变法只是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北宋的财政收入。北宋不同阶段的主要敌手并不一致，澶渊之盟前是辽，庆历年间以后则是西夏。宋辽之间实力相对均衡，而北宋对西夏一直保持较大的实力优势，宋朝儒学则是在仁宗庆历年间后发展昌盛的。

### 1. 太宗到真宗时期的对辽政策讨论

此时北宋主要对手是辽，双方实力势均力敌，东亚地区近似两极格局。北宋初年，儒家虽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儒学本身并不兴盛，道教影响较大。在北宋初期的决策者中，只有田锡儒学造诣较高，而柳开、胡旦和邢昺等其他儒家学者并未进入对辽决策圈。史书明确记载了道教的影响：宋太宗喜读《道德经》，两次召见华山道士陈抟；宋真宗更是喜好道教，痴迷祥瑞。

从战略目标来看，“大一统”的战略目标在从“四夷咸宾”退化为收复幽蓟“汉疆”。很多决策者已放弃“四夷咸宾”，倾向于“不治夷狄”，主张将戎狄“置之度外”。赵普认为，对夷狄应“置之度外……以禽兽畜之”。<sup>②</sup> 陈王赵元僖、钱若水都赞同班固的观点，认为对夷狄应“来则御之，去则勿逐”，宋太宗认为“治国

<sup>①</sup> 《汉书·魏相丙吉传》《汉书·萧望之传》。

<sup>②</sup>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

在乎修德，四夷当置之度外”，宋真宗则主张“固守封疆”。<sup>①</sup>持这一观点者的对外政策手段主张也相对消极，在征伐失败后都反对战争，主张与辽和好、消极防御以及维持边界现状。宋太宗在与大臣对话中多次引用《道德经》关于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法，宋琪也引用了类似话语，认为应与辽国“通盟结好，弭战息民”。<sup>②</sup>赵普认为不应与戎人计较胜负。赵孚和钱若水都强调“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赵孚提出“驯致率服，永无战争”的愿景，钱若水则认为，剪除戎狄不能“恃兵强”，只能等待其内乱。<sup>③</sup>此外，在应对实力远为弱小的西夏李继迁势力时，李至和杨亿等决策者也主张放弃灵州。<sup>④</sup>

但是，很多决策者仍然主张恢复汉唐“旧疆”。在太宗第一次北伐之前，李昉和张齐贤等虽然反对用兵，但也认为“恢复旧疆”是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sup>⑤</sup>除这两人外，几乎没有反对北伐的声音。即使在雍熙北伐失败之后，李沆、张洎和王禹偁等仍都认可两次北伐目标的合理性和战争的正义性。王禹偁认为，大一统原则要求收复幽蓟：“顷岁吊伐燕蓟，盖以本是汉疆……既四海一统，诚宜取之。”<sup>⑥</sup>少数决策者仍怀有“四夷咸宾”之志，他们的对外政策主张也较为积极，李昉、田锡和赵安仁等提出训练士兵、讲习武经、缮修攻具、使用间谍、提高边将便宜行事权等建议；王禹偁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激励边民等措施；张洎认为当前虽应“暂时降屈，以济艰屯”，但最终要“俟时大举”“取乱侮亡”，直捣龙庭，以定天下。<sup>⑦</sup>除李昉外，其余政策主张都是雍熙北伐失败后提出的，决策者并未因失利而放弃目标。

这一阶段决策者无论其政策倾向如何，都采取儒家自修的路线，即改善内政、增强国力和善修守备。太宗时期，张齐贤认为应当“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田锡认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sup>⑧</sup>真宗时期，张方平认为“绥怀远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四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十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正月》。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夏四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春》。

④ 李至认为“河湟之地，夷夏杂居”，叛服无常，应“置之度外”“屈己含垢”，对李继迁施以绥怀，以安边境、安万人；杨亿认为驻守灵武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地”。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纯化元年五月》。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人”的根本是“宽财用，纾民力，以厚为之备”。真宗认为，一方面“怀柔示信”，另一方面“不废戎事”，才能使辽国不违反盟约。宋辽边境长期安宁，李允则仍“治城垒不辍”，得到真宗的赞许。<sup>①</sup>

宋初士大夫对辽政策仍然使用德怀的话语，认为德怀优于武力。张齐贤认为，通过息兵弭边、以德怀远，可以使天下知晓太宗的仁惠之心，则“远人之归，可立待也”；赵普认为社会安定、边境安宁可使“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sup>②</sup>田锡认为，“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sup>③</sup>真宗对辽和解政策得到大多数决策者的赞许，向敏中称真宗“以德绥怀，远无不服”。<sup>④</sup>

宋朝关于义战的讨论与汉朝稍有不同。除贾谊和桑弘羊外，汉朝决策者就义战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其消极的一面，即对使用武力的限制；宋朝则侧重其积极的一面，即出兵的合理条件。北宋初年，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幽蓟地区是“汉疆”，收复幽蓟的军事行动属于义战范畴。但是，宋初君臣慎战情绪较强，即使主张“恢复旧疆”的决策者也认为当前国力不足、暂时不应再行对辽用兵。在这种气氛下，澶渊之盟后文武决策者虽偶尔对与辽和议有不同意见，<sup>⑤</sup>但鲜有提及对辽义战的建议。

假说1与该阶段的情况相符，持“不治夷狄”观点的决策者一直反对用兵，而力主“恢复旧疆”和少数仍支持“四夷咸宾”的决策者即使在战败之后仍然主张积极备战。假说2和假说3得到了支持，但该阶段德胜沦为一种空谈，主张采取军事手段的决策者都是以义战为前提的，很多决策者的慎战已接近厌战。王朝周期论和单极稳定论不完全符合该阶段事实，太宗早期宋朝君臣虽曾试图恢复疆土，但在两次大失利后，对外政策讨论转变为和解为主。权力政治论大致符合本阶段事实，宋辽两国势均力敌，宋朝决策者虽持有恢复旧疆的雄心，但力有不逮，在军事行动受挫之后，主张和解的决策者数量增加。

## 2. 庆历以降儒家战略文化对北宋对外决策的影响

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取代辽成为北宋主要边患，但北宋国力整体强于西夏。与此同时儒学开始兴盛，大批具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士大夫进入决策层。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天禧三年六月》。

②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五月》。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1·天禧二年三月》。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

庆历年间，儒学兴起，<sup>①</sup>石介、胡瑗、孙复、李觏、张载和周敦颐等开始著书立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和文彦博等儒学造诣极高的官员及其“同调”韩琦、富弼和张方平等人也开始进入决策圈，他们的子侄后学也进入仁宗之后各朝的决策集团。其后，儒学形成了关学、洛学、蜀学、新学和朔学等系统，有很多主要代表人物进入决策圈层。

这一阶段的很多决策者不满足于“恢复旧疆”，<sup>②</sup>而是怀有“四夷咸宾”的倾向。例如，韩琦认为，应等待时机收复“幽蓟、灵夏之地”，以“振耀威灵，弹压夷夏”。范仲淹认为，一旦“国力强盛，将帅得人”，就应“长驱破虏，以雪天下之耻”。富弼详细规划收复燕蓟的战略，以图“一举而复全燕之地，拔数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为澶渊之盟后首次。欧阳修认为，西夏侵地是“中国合争之事，岂可不争”，<sup>③</sup>并提出了由高到低的三个目标：“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复朔方故地”和“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sup>④</sup>神宗希望“直捣兴、灵，覆贼巢穴”，王安石也多次提及“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目标。<sup>⑤</sup>哲宗亲政后绍述神宗对外战略目标，徽宗则希望“声教暨乎遐荒，威武畅乎无外”。<sup>⑥</sup>即使是元祐更化时期最积极的反战派领袖司马光，也认为宋朝的最终战略目标应是“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驱穹庐于漠北，复汉、唐之土宇”。<sup>⑦</sup>这一阶段，“不治夷狄论”虽仍有一定影响，但并非主流。<sup>⑧</sup>

与宋初决策者受道家影响消极厌战的态度不同，这一阶段的决策者更倾向于使用积极的手段。韩琦和张方平明确反对宋初“保疆守境”的专主防守战略，认为这一战略无法消除“贼势”，必然导致旷日持久的消耗，“费财无功，损威示弱”。<sup>⑨</sup>经过张方平和刘平的早期探索，范仲淹和韩琦等最终总结出对西夏战略新的手段，提出徐图缓进的“修寨—浅攻—进筑”战略。该战略的要义是一方面增强沿边各路军

①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参见《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页。

② 两宋儒家代表人物恢复情节极强，张浚张昞父子、朱熹、吕祖谦、叶适、陈亮、陆九渊和真德秀等南宋儒家代表人物无不热心于“恢复大业”。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

⑥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大观二年正月》。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治平四年九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5·治平二年六月》。

⑧ 如苏轼作《王者不治夷狄论》，但其意见并非政界主流。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事实力，修筑沿边城寨，在各路相互策应协调的基础上以“四散攻击”和“浅入大掠”<sup>①</sup>为手段对敌边界进行骚扰，使敌军不得首尾相顾，消耗敌军；另一方面，选取远离西夏腹地、靠近宋朝边境且具有战略价值的西夏边地，攻取之后屯兵营田，步步为营，逐步削弱西夏，“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sup>②</sup>1044年，韩琦与范仲淹提出利用该战略在数年内尽取横山山界。这一战略既可“拓疆制寇”，又“无轻举之失”。<sup>③</sup>

仁宗后期，由于连年兵败，仁宗厌战情绪增加，加之辽夏交恶，北宋面对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韩琦与范仲淹的战略并未实行，但其战略却成为北宋之后数朝的主导战略。除司马光、韩维和苏辙等少数派的保守派决策者外，薛向、范纯粹（范仲淹子）、安焘（胡瑗弟子）、范育（张载弟子）、吕大防（张载“同调”）和章粼等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略，王韶、吕大防、韩绛、种谔、沈括与章粼等则对其加以实践。最终，西夏的战略空间受到极大挤压，基本丧失横山和天都山屏障，不得不请求辽国调停，并毒杀了好战的小梁太后。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阶段大多数决策者都主张对辽维持修好，但不少决策者也仍怀有恢复情结，对辽持“待弊”的态度。例如，韩琦认为“俟敌果有衰乱之形”便可“一振威武，恢复旧疆，快忠义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愤”。<sup>④</sup>徽宗也持此种态度，因此，李良嗣才劝诱其“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谪，以治伐乱”。<sup>⑤</sup>

这一阶段决策者对自修手段没有异议。宋祁和欧阳修等都提出了减少“三冗三费”、通漕运、尽地利与榷商贾等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措施。<sup>⑥</sup>范仲淹等认为“疆场不靖”是末，纲纪制度是本，大力推行“庆历新政”，以“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sup>⑦</sup>神宗时期，王安石与其政敌司马光在自修的重要性上有较一致的看法，前者认为“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场，而在于朝廷”；司马光认为“国家先当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备，然后可以征伐四夷”。<sup>⑧</sup>哲宗时期，章惇认为拓边的前提是“钱粮足备，民力有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庆历元年正月》。

④ 《历代名臣奏议·卷330》。

⑤ 《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一》。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一月》。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

余”；在战术层面，章粦认为应“先固根本，俟粮草有备，兵民安居，然后更议斥大疆土”。<sup>①</sup>

这一阶段，宋朝决策者对西夏使用德怀的话语较其他时期较少。这或许是因为李元昊不断蚕食宋朝领土，宋朝决策者逐渐认为无法以德怀柔西夏。李元昊初叛时，大多数决策者主张征讨，只有吴育提出通过自修使“四夷望风”，遭到宰相张士逊嘲笑。但很多决策者并未放弃对其进行德怀。范仲淹开始接手西北边务之时，也希望“招携蕃族首领”，“示以恩意”，“通朝廷柔远之意，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之礼”；<sup>②</sup>李元昊因国力不支，向宋廷约和，仁宗、张方平和晏殊等都乐于对其使用怀柔政策。结果西夏一面称臣纳贡，一面侵扰宋朝边境，德怀政策逐渐失去支持。

该阶段对于义战的坚持体现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讲，既然抵御西夏蚕食宋朝西北边疆、收复“灵夏旧疆”是正义的，那么对西夏采取军事手段就不是暴力扩张的非正义行为。从消极方面来讲，1044年，辽夏爆发矛盾，经过讨论，北宋朝廷未利用辽夏矛盾实现自身利益，而是“以大义而两存之”，在辽夏之间选择中立，以使“西人无陡绝之曲，于北鄙无结怨之端”。<sup>③</sup>李元昊遇刺重伤身亡后，仁宗听从程琳“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的建议，未趁机向西夏发动进攻。<sup>④</sup>

受慎战文化影响，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决策者反对深入远征。仁宗时期，夏竦上书，反对“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的深入追讨政策；范仲淹明确反对部分官员五路进讨西夏的主张，<sup>⑤</sup>其所制定的对西夏战略手段亦较为持重。持相似观点的还包括杜衍、庞籍、张亢和田况等。神宗时期，慎战的约束力下降。王安石变法曾一度使宋朝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大梁太后囚禁夏主李秉常为其提供了伐夏的理由，“恢复旧疆”的目标和义战的原则给予其出兵的合理性，他突破了慎战的劝谏，制定了五路远征伐夏、进驻永乐城的冒进政策，并得到很多决策者的支持。但这一政策遭到了文彦博、吕公著、李固、赵鼎和范纯粹等决策者的激烈反对，其惨烈失败更引起神宗时期以后决策者的持续诟病。

仁宗以降，持“四夷咸宾”论的决策者比受“不治夷狄”和道家影响的宋初决策者更倾向于积极政策，假说1成立。假说2中，自修得到所有决策者的支持，但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5·绍圣四年四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

④ 《宋史·列传第四十七》。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夏四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

是德胜优先在该阶段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弱。假说3 慎战的预测在该阶段基本得到体现，在神宗时期的例外情况中，慎战原则受到“恢复旧疆”和义战原则的削弱。北宋并没有明显衰退的王朝周期，王朝周期论与该阶段不具相关性。宋朝实力强于西夏，其对西夏政策与对辽政策讨论差别明显，王安石变法使财政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一时间对西夏政策讨论的进攻性突显，权力政治论在该阶段成立。宋朝不是地区单极，对外政策军事倾向较重，单极稳定论成立。

### （三）永乐至万历中期明朝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虽然明朝总体实力强于其主要对手蒙古（主要是东蒙古和卫拉特蒙古<sup>①</sup>），但二者实力对比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永乐至正统中期，明朝实力强于蒙古；正统后期到景泰年间以及弘治后期到嘉靖年间，卫拉特蒙古与东蒙古先后崛起，对明朝边境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隆庆至万历中期，明朝实力有所恢复，再次对蒙古形成优势。明朝儒学兴盛，已是主导性学说，<sup>②</sup>“不治夷狄”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 1. 永乐至正统中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这一阶段，明朝对蒙古享有较大实力优势，东亚地区近似单极格局，儒学兴盛。此时“四夷咸宾”的战略目标仍占据主流，但“不治夷狄”论亦有影响。太宗朱棣认为其“奉天命为天下君”，对外战略目的是“统御万方，抚辑庶类”，“主宰华夷”，对于敢于抗命、犯边的东蒙古，认为“逆命者必歼除之”。<sup>③</sup> 宣宗朱瞻基亦称自己“统御天下，绥辑之仁无间遐迹”。<sup>④</sup> 但是，即便是太宗也受到“不治夷狄”论的影响，多次提到“王者制夷狄之患，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仁宗朱高炽年间，范济认为朝廷应“专务内治，不勤远略”。卫拉特蒙古蚕食东蒙古时，宣宗虽对阿鲁台表示同情，但也主张“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sup>⑤</sup> 与此相应，范济和刘球等主张对待蒙古的主要手段是守险、修缮城堡、坚壁清野与严加守望等消极防御手段。

自修仍是大多数决策者的共识。太宗甚少谈及自修的重要性，但也认为通过休

① 即明朝史料所称的“鞑靼”和“瓦剌”。

② 不过明朝儒学的面貌较之北宋已发生巨大变化，包括经学衰落、理学兴起，道统说确立，思孟学派成为主流，荀子和扬雄等人地位下降等。

③ 《明太宗实录·卷111·八年十二月》《明太宗实录·卷101·八年二月》《明太宗实录·卷250·二十年八月》《明太宗实录·卷93·七年六月》。

④ 《明宣宗实录·卷107·八年十一月》。

⑤ 《明太宗实录·卷272·二十二年六月》；《御选明臣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4—26页；《明宣宗实录·卷78·六年四月》。



养生息、严加守备、广兴屯田，就可“使兵坚边实，虏不足虑矣”。<sup>①</sup>仁宗告诫武将“国家之政莫重于兵备，虽四方无事，然不可一日忘备”；<sup>②</sup>宣宗时，卫拉特蒙古和东蒙古都遣使朝贡，其仍然下令“严饬兵备，不可怠忽”。<sup>③</sup>范济、刘球主张修饬内政，则“远人自服，荒外自归”，“退修德教，以待其降”。<sup>④</sup>

这一阶段决策者在政策讨论中都体现了德怀优先的倾向。即使是在永乐年间，对蒙古的征伐也全是在蒙古部落骚扰边境、德怀政策失效后才采取的措施。太宗在劝谕东蒙古本雅失里时指出，若其能“幡然来归”，便可“加以封爵，厚以赐赉，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惟尔所欲”；在劝谕卫拉特马哈木时指出，其若能“悔过谢罪”，则将待之如初。<sup>⑤</sup>只有在德怀政策失效“恩既数背，德岂可怀”之后，才采取远征逆虏的不得已之举。<sup>⑥</sup>杨士奇赞许太宗对待有罪的外国，“必先遣人再三抚谕，及其不从，然后加兵”。<sup>⑦</sup>宣宗时期，对卫拉特蒙古与东蒙古都以德怀为主，允许其朝贡、赠送其礼物、开通马市，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英宗北狩之前。

这一阶段，义战原则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得到运用。在积极方面，太宗讨伐东蒙古的理由是其“负朕恩，戕杀使臣，又欲扰边”，讨伐卫拉特蒙古的原因是其“拘杀朝使，侵略边境”。<sup>⑧</sup>在消极方面，宣宗时，东蒙古阿鲁台遭到卫拉特马哈木追杀，朝臣建议趁机消灭阿鲁台势力，宣宗反对“利人之灾困人于危”，并敕谕阿鲁台安居边塞，勿生疑心。<sup>⑨</sup>而慎战原则至少得到决策者原则上的认同。“四夷咸宾”的战略目标和义战的思想使太宗打破慎战原则，五征漠北。但即使如此，太宗也深知“勤兵于远，非可易言”。杨士奇认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轻用”，范济则反对穷兵黩武、犁庭扫穴、占据不毛之地。<sup>⑩</sup>

假说1对这一阶段政策讨论的解释相对含糊，因为决策者同时受到“四夷咸

① 《明太宗实录·卷104·八年五月》。

② 《明仁宗实录·卷6上·元年正月》。

③ 《明宣宗实录·卷86·七年正月》。

④ 《御选明臣奏议》，第26—27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105·八年六月》《明太宗实录·卷77·六年三月》《明太宗实录·卷136·十一年二月》。

⑥ 《明太宗实录·卷101·八年二月》《明太宗实录·卷104·八年五月》《明太宗实录·卷152·十二年六月》。

⑦ 《明经世文编·卷15·杨文贞公文集一》。

⑧ 《明太宗实录·卷93·七年六月》《明太宗实录·卷146·十一年十二月》。

⑨ 《明宣宗实录·卷82·六年八月》。

⑩ 《明太宗实录·卷140·十一年六月》《明经世文编·卷15·杨文贞公文集一》；《御选明臣奏议》，第24—26页。

宾”和“不治夷狄”的影响，前者影响似乎更大，这解释了该阶段较为积极的对外政策讨论；与其他时期一致，假说2和假说3得到了史料的支持。王朝周期论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到了永乐时期的决策结果，但未能预测决策过程，如不能解释太宗德怀优先的倾向，也不符合洪宣时期的政策讨论；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蒙古两部相互攻伐，明朝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有利，权力政治论能够解释太宗使用武力的倾向和洪宣时期的德怀倾向；单极稳定论解释了仁宣时期的对外政策讨论，但不能解释太宗使用武力的政策倾向。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除四代帝王本身留有实录外，这一阶段杨荣、夏原吉和蹇义等其他主要决策者都未留下详细的对外政策讨论文本。由于史料的相对单一性，该阶段对各假说检验的可靠性较低。

## 2. 正统后期到万历中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该阶段明朝对蒙古的实力对比起起伏伏，但整体来讲明朝比上一时期衰落更为明显，尤其是正统中期以及弘治后期到嘉靖时期，卫拉特蒙古和东蒙古分别出现强势领袖；隆庆到万历中期，俺答封贡、张居正变法后，明朝边境稳定，实力积蓄，而蒙古各部纷争严重，实力对比又有利于明朝。总体来说，明朝整体实力仍强于蒙古各部，因此，邱浚认为，“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韩邦奇认为明朝“防边之兵较前代为疏，盖前代当虏之强我国家当虏之弱”。<sup>①</sup>

该阶段“不治夷狄”论大行其道。无论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变化，本时期明朝对蒙古政策的主流都是“不治夷狄”。正德和嘉靖年间的李东阳与杨一清明确提出“王者不治夷狄”的主张，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的王崇古认为对夷狄应“听其强弱去来”。<sup>②</sup>决策者的政策讨论多主张“固守封疆”，“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于谦语）、“慎固封守”（李东阳、叶盛、王琼语）；“御戎之道，当以守备为本”（秦紘语）、“藩篱既固，堂室自安”（梁材语）；“贡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方逢时语）。<sup>③</sup>持类似观点的重要决策者包括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年间的郭登、李秉、商辂和余子俊，成化至嘉靖年间的王琼，正德和嘉靖年间的梁材，嘉隆万年间的徐阶、高拱、杨博、王崇古、戚继光和方逢时等。值得注意的是，于谦、杨一清、余子俊和戚继光等人均是对外作战、整顿边备颇有建树的名臣，他们的对外政策观

① 《明经世文编·卷73·丘文庄公集第三》《明经世文编·卷161·苑洛集二》。

② 《明经世文编·第316卷·王鉴川文集一》。

③ 《明经世文编·卷33·于忠肃公文集一》《明经世文编·卷109·王晋溪本兵敷奏一》《明经世文编·卷68·秦襄毅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104·梁端肃公奏议三》《明经世文编·卷321·方司马奏疏二》。

点在其各自的时代已较具积极性。此外，明朝理学大师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多次强调华夷之间的“大界限”和“谨内外之防”。<sup>①</sup>在具体政策上，多数决策者都主张出境远哨（翁万达语）、凭高据险、坚壁清野、“婴城固守”（王守仁语）、<sup>②</sup>修筑防御工事（如杨博的墩城和戚继光的空心台）、“合兵防御击杀”（王越语）以及“邀其归路”（杨一清语），<sup>③</sup>这些主张都不出“以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sup>④</sup>的被动防守窠臼。王越、杨一清、翁万达、杨博和刘焘等部分决策者持较为积极的“捣巢”主张，亦不过是战术性破坏敌人后方，并无长远规划。更具有进取性的政策主张，如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杨一清此前也曾提出这一建议）则遭到了除夏言以外大多数决策者的反对。此外，本时期的决策者大都反对给予边将“阃外之权”，倡导“不侥幸以邀功”。<sup>⑤</sup>

该阶段的决策者对于自修作为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没有异议。马文升认为，文德武备并修，便可以“慑伏四夷”。嘉靖时期，蔡汝楠认为“自古御夷，咸先自治，养锐以待”；冯恩认为“内治修，然后远人服”；张璁强调“武备修则中国强”，中国强则夷狄衰而盗贼息矣”。<sup>⑥</sup>王琼认为，内治是本，远略是末，不能本末倒置，“忽内治而专事夷狄，未有不貽患者也”。<sup>⑦</sup>很多决策者认为，无论朝廷与蒙古关系如何，都应重视备战。例如，叶盛认为“逆虏之来不来不足问，顾我之有备无备何如耳”；翁万达认为蒙古“贡亦备，不贡亦备”。<sup>⑧</sup>高拱强调利用和平环境发展壮大，巩固根本，使“常胜之机在我”，掌握战略主动权，“彼若寻盟，我仍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约，我遂兴问罪之师。伸缩进退，自有余地”，张居正亦持类似观点。<sup>⑨</sup>

该阶段多数决策者倾向于认可德怀优先于武力。于谦与邹来学认为“朝廷之驭

① 《大学衍义补·卷143·内夏外夷之限上》《大学衍义补·卷144·内夏外夷之限下》。

② 《明经世文编·卷130·王文成公文集一》。

③ 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明经世文编·卷69·王威宁文集》《明经世文编·卷116·杨石淙文集三》《明经世文编·卷157·刘庄襄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190·毛给谏文集》《明经世文编·卷275·杨襄毅公奏疏三》《明经世文编·卷316·王鉴川文集一》。

④ 《明经世文编·卷209·李司农集》。

⑤ 参见《明经世文编·卷157·刘庄襄公奏疏》，于谦、徐问等亦有类似论述。先秦儒家提倡给予边将便宜行事之权，汉朝对边将擅自行动相对包容，成就常惠、冯奉世、郑吉、陈汤、班超等人的边功；宋朝对边将的擅自行为较为警惕，但对韩绛、种谔等人的惩罚力度有限；明朝则对这种行为严格限制。

⑥ 《明经世文编·卷63·马端肃公奏疏二》《明经世文编·卷315·白石先生集》《明经世文编·卷200·冯侍御白菴录》《明经世文编·卷178·张文忠公文集三》。

⑦ 《明经世文编·卷109·王晋溪本兵敷奏一》。

⑧ 《明经世文编·卷59·叶文庄公奏疏一》《明经世文编·卷224·翁东涯文集二》。

⑨ 《明经世文编·卷301·高文襄公文集一》《明经世文编·卷326·张文忠公文集三》。

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宽恕……示以至诚无伪，如此或者因此知我有备，益坚向化之诚……尽怀柔之道，庶使丑虏无词，不敢轻动”。<sup>①</sup>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也先请求朝贡，于谦虽不知其背后原因，却认为“中国之取夷狄，固当振之以兵威，尤当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sup>②</sup>主张接受也先的朝贡。成化与弘治时期，马文升主张“敦怀柔之道”，使“北虏”没有开启衅隙的理由，“虽小犯边，不足深虑”；邱浚赞赏虞周时期对外国“化之也非征之也”。<sup>③</sup>嘉靖年间，俺答请求封爵、互市之时，翁万达、史道、桂萼和霍韬等多数决策者主张“因通贡之机，广戎夷迁善之路”，<sup>④</sup>反对杀蒙古使臣石天爵、悬赏刺杀俺答之举。隆庆与万历年间，高拱、王崇古、方逢时和王锡爵都主张允许俺答封贡互市，“悬爵位之虚号，以邀荒裔之臣伏”，以使“在我足以为恩，在彼足以为德”，“坚其畏威归化之心”。<sup>⑤</sup>当然，也有少数决策者倾向于认为德怀与武力并无优先次序。如王琼认为，御夷之道，在于抚顺剿逆，二者不可偏废。<sup>⑥</sup>

该阶段除曾铣和夏言等极少数个例外，绝大多数决策者对于军事征讨尤其是长驱深入远征持谨慎态度。桂萼认为“竭国以奉军，倾中以资外，乃不识时宜书生无深谋远虑者之谈也”，<sup>⑦</sup>余子俊的名言“宁成功于门庭之间，勿远致于敌人之境”则被奉为圭臬。<sup>⑧</sup>杨一清和方逢时等人都使用过“兵凶战危诚宜慎重”的话语。<sup>⑨</sup>王骥和余子俊等将领以及于谦、梁储、桂萼和翁万达等重臣都反对穷追和长驱深入。

与其他时期有所不同，该阶段义战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防御作战而非“四夷咸宾”或“恢复汉疆”。由于各股蒙古势力的不断骚扰，没有决策者质疑对蒙古防御性作战的正义性，几乎所有决策者都认可对侵略者进行防御性反击，包括夜间偷袭、合兵击杀、邀其归路与蹶后截杀，部分决策者还主张“搜套”和“捣巢”等。这一阶段对义战的消极论述较少，这大概是因为大多数决策者都反对且不论进攻性战略，因此对此种战略的批评也较为鲜见，较突出的事例是嘉靖年间张岳反对以

① 《明经世文编·卷34·于忠肃公文集二》。  
② 《明经世文编·卷34·于忠肃公文集二》。  
③ 《明经世文编·卷63·马端肃公奏疏二》《大学衍义补·卷148·修攘制御之策上》。  
④ 《明经世文编·卷186·霍文敏公文集二》。  
⑤ 《明经世文编·卷316·王鉴川文集一》《明经世文编·卷320·方司马奏疏一》《明经世文编·卷301·高文襄公文集一》。  
⑥ 《明经世文编·卷109·王晋溪本兵敷奏一》。  
⑦ 《明经世文编·卷181·桂文襄公奏议三》。  
⑧ 《明经世文编·卷109·王晋溪本兵敷奏一》。  
⑨ 《明经世文编·卷117·杨石淙文集四》。

“不通贡”为由征讨安南。<sup>①</sup>

从王越取得红盐池与威宁海大捷的情况来看,至少在该阶段的很多不同时期,明军具备在一定范围内机动的能力,但当时主导的战略文化使决策者在政策讨论中反对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这一事实削弱了权力政治论的解释力。“不治夷狄”论的兴起是本阶段消极的对外政策讨论的有效解释,支持了假说1。与其他两个案例一样,假说2和假说3得到了史料的支持。王朝周期论未能解释中兴时期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单极稳定论的预测基本符合事实。

## 六、结论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内容和特色的概括较为片面,未能系统探讨儒家战略文化的发展演变,而是侧重政策结果,也没有考察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原各政权决策过程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先秦时期的儒家战略文化,并归纳出其三个特点。其一,在对外政策目标上追求“四夷咸宾”,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不治夷狄”论。其二,在对外目标的实践手段上注重自修,主张德怀优先于使用武力。其三,在对使用武力的态度上,讲求义战原则,同时讲求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深入远征。儒家追求“四夷咸宾”,主张修饬武备和义战,不反对非武力扩张和非扩张性进攻等特点,与既有文献归纳的“非扩张性”和“防御性”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而德怀的优先性、使用武力必须符合义战原则及慎战原则与某些西方学者“防御崇拜”的论述完全不同。

本文将儒家战略文化假说与其竞争性假说——王朝周期说、权力政治说和单极稳定说——进行对比,通过案例分析检验其解释效力。根据案例检验,可得出表1。表1显示,关于战略文化对对外政策讨论影响的三个假说的预测都较为准确。如假说1预测,在“四夷咸宾”论占据主导地位时的对外政策讨论——包括西汉两个时段对匈奴政策的讨论、宋仁宗到徽宗时段的对西夏政策讨论、明朝前期对蒙古政策的讨论——都较为积极,倾向于采取某种形式的非武力性扩张或非扩张性进攻行动。而在“不治夷狄”论占主流的明朝中后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中,决策者大都倾向于消极的被动防御政策。在宋太宗到宋真宗时期的对辽政策讨论中,支持“四夷咸宾”论的决策者倾向于相对积极的对辽政策,而支持“不治夷

<sup>①</sup> 《明经世文编·卷193·张净峰文集一》。

狄”论或受道家影响较大的决策者倾向于相对消极的政策。假说2中，自修在各个时期都得到了支持，德怀先于武力在除宋仁宗到宋徽宗的对西夏政策讨论外，都得到了支持。假说3的义战思想在各时期都有体现；慎战思想在大多数案例中也都得到了体现，但在宋神宗时期、明太宗时期等个别例外中受到了“恢复旧疆”“四夷咸宾”和义战原则的削弱。

王朝周期论和权力政治论对各时期对外政策讨论的预测则表现不佳，预测准确率都在一半以下。与王朝周期论预测相反，汉朝全盛和中兴时期的政策讨论并未更具扩张性，宋朝中期比早期政策更为积极，明朝中兴时期的政策讨论也不具扩张性。与权力政治论预测相反，汉初国力相对匈奴较弱时政策讨论的积极性大于中期国力远胜匈奴时；明朝中兴时期，权力对比有利于明朝时，政策讨论却呈现出消极防御色彩。在三个竞争性假说中，只有单极稳定论的预测较为准确。中原政权处于东亚单极时期，其对外政策讨论偏向于防御与和解，而在中原政权处于非单极状态时，其政策讨论倾向于扩张性和进攻性。

表1 本文假说在不同时期解释力的有效性

时段	假说1	假说2	假说3	王朝周期论	权力政治论	单极稳定论
汉文帝到汉武帝早期（匈奴）	+	+	+	+	-	+
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匈奴）	+/-	+	+	-	-	+
宋太宗到宋仁宗时期（辽）	+	+	+	+/-	+	+/-
宋仁宗到宋徽宗时期（西夏）	+	+	+	-	+	+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的（蒙古）	+/-	+	+	+/-	+/-	+/-
明正统到万历中期（蒙古）	+	+	+	-	-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假说得到支持，“-”表示假说未得到支持，“+/-”表示假说得到微弱或不完全支持。

本文发现，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国古代对外政策讨论具有重要影响。自修、德怀与德胜以及义战与慎战等思想在各个朝代都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中国古代决策者认同“四夷咸宾”（或“恢复旧疆”）论抑或“不治夷狄”论，对其对外政策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不治夷狄”论在明朝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原政权对外政策逐渐转变为消极防御。江忆恩认为儒家战略文化只是一种符号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当然，战略文化对政策讨论的重要影响并不意味着其能决定对外政策的结果。在本文案例中，对外政策讨论与对外政策结果在大多数案例中保持一致，但亦有例外。例如，在汉武帝、宋神宗和明太宗时期，虽然参与政策讨论的很多决策者都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和深入远征，但最终结果并没有体现出大多数人的政策建议。汉宣帝时期的对匈奴政策亦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这一现象表明，主导性战略文化虽能通过政策讨论对政策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却无法决定对外政策结果，其还受到关键决策者倾向、权力对比、决策模式与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儒家战略文化内部有一定张力。与“四夷咸宾”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一般更为积极，虽然这类决策者更倾向于非进攻性扩张（即德怀基础上的扩张）以及非扩张性进攻（即“恢复旧疆”、防御性的进攻行动），但这种政策有时与自修、慎战原则存在某种张力；“不治夷狄”论则与自修、慎战思想在逻辑上完全相符，这或许是“不治夷狄”论逐渐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

儒家战略文化中大一统观念、自修、慎战、对过度扩张的警惕，坚持、死守疆土、“不可以尺寸予人”<sup>①</sup>的决心，都对爱好和平、天下情怀、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其注重用经济文化手段处理对外关系等策略亦对中国当代外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儒家战略文化也具有严重的时代局限，集中体现在很多儒家代表人物对外交手段的轻视，并以决策者的个人道德观念取代国家的实际利益，这启示我们应批判性地看待儒家战略文化中追求权力优势的思想以及“义战”的标准等内容。

（截稿：2024年11月 责任编辑：郭 泉）

<sup>①</sup> 《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complexities of African state-building and presents policy references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mote state-building by restoring political trust.

【Keywords】 slave trade, state-building, political trust, mixed methods, African studies

【Author】 HUANG Zhenqi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Self-Cultivation, Virtue-Based Persuasion and Just War: How the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Affects Foreign Decision-Making**

**PANG Ruizhi (123)**

【Abstract】 The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oreign decision-making in ancient China.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reveals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trand of strategic culture: the objective of settling the foreigners, the prioritization of self-cultivation and virtue-based persuasion over military force in achieving its goals, and the emphasis on prudence and justice in the use of force. However, internal tensions existed within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Over time, the argument of “the King does not intend to rule all the Yi” emerged and eventually gained prominence. Drawing on discussions of foreign policy recorded in texts from the Western Han, Norther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relative to the competing theories of dynastic cycle, Realpolitik, and unipolar stabilit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had greater influence on foreign decision-making discourse than the competing the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unipolar stability theory. Specifically, decision-making became more proactive when guided by the argument of “settling the Yi”, whereas it was more restrai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rgument of “the King does not rule the Yi”. Furthermore, self-cultivation and virtue-based persuasion were consistently favored over military force in achieving strategic goals. Lastly, while the principles of prudence and justice in the use of force were generally uphel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principles—particularly when combined with the settling the foreigners argument—occasionally led to the undermining of caution.

【Keywords】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foreign decision-making, self-cultivation, just war, settling the Yi

【Author】 PANG Ruizh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